

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

李如龙

—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老一辈语言学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调查了大量西南腹地的民族语言，对于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汉藏系诸语言，开始有了中国学者的重要见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过全国范围内民族语言的调查又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材料，尤其可喜的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开展了各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比较研究，逐步深入地探讨了各个语系、语族、语支的源流、演变和相互间的接触与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的过程中，老中青几代学者，民族语言界和汉语界的学者，境内和境外的学者携起手来，正在实现国际接轨。中国学者的成果出现了许多亮点，进入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这种可喜的局面说明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但是建设汉藏语言学的需要，对于推动汉语史的研究，建设汉语语言学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汉语史、汉语方言的学者，越来越体会到，和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不但可以解决诸多汉语研究中难以解开的谜，而且可以打开更加广阔的思路，把汉语的研究推上更高的档次。李方桂屡次提出，“汉语与别的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是“发展汉语上古音的一条大路”。周法高（1972）说得更具体：“就汉语而研究汉语总不容易跳出前人的圈子来。”如果对汉藏诸语言能有所认识，“便可以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改进我们的看法，而使我们的方法更加细密，进一步可以上溯到原始汉语的阶段，而企图对汉藏语有所构拟，那么，这一门学问便有很大的发展了。”过了 20 年，1992 年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在新加坡成立，首任会长王士元在演讲中又提倡“研究多种非汉语”，并指出，“特别要注意它们和汉语方言的相互影响”。（王士元，1993）

汉语方言最复杂的是东南部诸方言。两千年前，东南地区曾是蛮夷、百越杂居之地。汉人南来和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长期的融合过程，移民带来的中原汉语和诸多少数民族语言也发生了许多渗透和交融，这显然是造成东南方言的殊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两千

多年的交往、结合中，必定有原住民改口说汉语时掺杂了自己的原来的语言的过程；也必定有汉人借用民族语言的词汇，套用其语音或语法规律的事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底层”现象。究竟这样的底层在东南方言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究竟东南方言是原住民改口说得并不地道的以少数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古南方方言”，或是吸收某些民族语言特点的汉语的新地变异？近些年来研究东南方言的学者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看来，在底层研究尚未深入进行的情况下，还不宜匆忙做出结论。无论如何，底层研究是值得提倡，应该加强的，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应该可以从方言结构体系的整体上做出科学的分析，也可以联系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互动去进行必要的论证。

为了使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更加科学化，我们应该对已有的这一类研究作一番思考和总结，着重于方法论的分析，看哪些思路和做法更加合理和有效。

二

已有的底层研究往往是从若干词汇入手的。在此类研究的“初级阶段”，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也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使人们得到重要的启发。例如粤语、闽语地区的许多地名中带有“那、拿，六、禄，滴、畚，畚、鞞”以及“凶、寮、坂、崇、潭、垌、垌”等字，这些地名显然是壮侗语族的先民在汉人南下之前就已命名、后来一直沿用下来的。这种现象用来说明原住民族居住地的分布比之地下发掘的文物是更有说服力的。有一批见诸多种东南方言的日常生活很常用的单音词，在古代汉语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字（俗称“有音无字”），许多学者也从“古百越语”（今壮侗语）里找读音相近、语义相同的说法，不少已被人们普遍认可。例如：

乳房 梅州nen⁵，泉州lin¹；彬桥壮语num²，阿博尔语ke-rum。

（粥）稠 广州kyt⁸、kit⁸，泉州kap⁸，潮州kuuk⁸；武鸣壮语kut，柳江壮语kuuk，临高话kot⁸。

松脱、滑落 广州说let^{7b}，梅州、厦门说lut⁷；龙州壮语lu:t⁷，西双版纳傣语lut⁷。

嗜好 广州ŋam⁵，泉州gam⁵；武鸣壮语gam⁵，完全同音。

想、思考 广州音nam⁴，梅州ŋiam³；邕宁、柳江壮语nam³。

傻 厦门音gɔŋ⁶，广州、梅州ŋɔŋ⁶；傣语ŋoŋ，黎语ŋaŋ。

次（量词） 厦门pai³，梅州pai³；壮语、布依语、傣语均音pai²，相近。

多 闽语读齐韵从母去声，建阳lai⁶，福州sa⁶，厦门tsue⁶ 均符合对应；通什黎语t:ai¹，彬桥壮语、芒市傣语 la:i¹，可能同源

盖上 闽语读为溪母勘韵去声（厦门），亦可读入声，各点均能对齐：厦门k'am⁵、k'ap⁷，福州k'aiŋ⁵；与壮侗语可以对应：武鸣壮语ko:m⁵，傣语hɔm⁵，水语kəm⁵。

（用热水）烫 梅州说luk⁸，广州音lok⁸；武鸣壮语lo:k⁸，龙州壮语luk⁸，德宏傣语lok⁸。

挖 福州leu¹，温州lau¹；侗语leu¹的音义也很相近。

吮吸 福州sɔŋ⁷，厦门suŋ⁷，广州sɔk⁷；侗语sot⁹、ɕut⁹，武鸣壮语θut⁷，泰语su:t⁷。

泡沫 闽语读音对应：福州p'uoŋ⁸，厦门p'eŋ⁸；多数傣语音pok⁹或pok⁷，读音相近。

边缘 闽语读为匣母仙韵平声，俗写𦨭，傣语读为him²（景洪）、hin²（武定）、hiŋ²（绿春），声母声调应有对应关系。《广韵》有“舷”，胡田切：船舷，苏轼的《赤壁赋》有“扣舷而歌之”句，那是专指船之边缘，可能这是闽语中的壮侗语底层。

此外，闽语里还有不少说法和壮侗语的一些点音义也似有对应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以闽南话为例：

填（坑） 闽南说t'un⁶，傣语马关t'en⁴，元江t'en⁵，芒市t'am¹，景洪t'un¹。

计算 闽南说t'ak⁸，芒市傣语说ta:k⁸。

洗（衣） 闽南说lak⁸，水语说lak⁷，武鸣壮语、傣语sak⁸，龙州壮语lak⁸，布依语sa⁸。
（壮侗语之间l—s 有对应关系）

喝 闽南说lim¹，临高壮语说lum⁴，佯侬黄ro:m⁴，巴哈布央语ram⁴⁵。

下陷 闽南说lam⁵，“烂泥田”说“畚田”，因为有音无字，《十五音》造了这个俗字。傣语多有类似说法：芒市lan⁵，景洪lum⁵，金平、马关lum⁵。

躲藏 闽南说biŋ⁷，傣语也有类似说法：mep⁸（孟连）、mep⁹（元阳）。

死 闽南有戏谑说法tai³，壮、傣、水语都说tai¹，侗语说təi¹，苗瑶语中巴哼话说tei⁶，勉语说tai⁶，都似有对应关系。

屎 闽南话可以sai³（屎）eŋ⁸连说，后者有音无字，在布依语、侗语说e⁴，水语qe⁴，回辉话ŋe³³。

成束的稻草 闽南说ts'au³ ha²，后者有音无字，也用作量词。武鸣壮语茅草说ha²，

龙川音ka²，布依语说ya²，泰语说k'a²，也可能成对应。

手脚结的茧 闽南说lan¹（粤语也说lan⁵），读音相近见于邕宁壮语nen⁵⁵（意义疙瘩），都读为平调。

少量舀取 闽南说ta⁷，在西双版纳和德宏傣语、泰语、傣雅语非常一致地说tak⁷，但不一定舀得少，这是闽语借用壮侗语无疑。

擤（鼻涕） 闽南说san⁵，大多数傣语都说saŋ⁶，只是韵尾和阴阳调未全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汉语方言的核心词，虽然也可以在古汉语韵书和典籍上查出音切、义注和用例，经过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也可以确认这些词并非汉语的语源，而是和南方民族语言同源的。例如潘悟云、陈忠敏的《释“侬”》（1995）一文，经过详细论证之后，指出：“侬是古代广泛分布于江南的方言词，既有‘人’义，也用来自称。在现代的吴、闽、徽、赣、粤诸方言中还有它的分布。”“侬可能就是古百越语词，意义为族称和自称。古代百越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把他们自己语言中用于族称和自称的noŋ保留下来，成了这些方言中‘人’义和第一人称的方言词。”关于这一点，就闽方言的情况还可以做一些补充：除闽北方言称人为“人”之外，现代闽语还普遍称人为“侬”，而且普遍用来指第一人称。如说“侬唔去，硬叫侬去”（人家我不去，硬叫我去）。在闽南话里不少地方复数人称代词还说“我侬、汝侬、伊侬”，和吴方言旧时的“三侬”之说毫无二致。与“侬”相类似，闽语里还有另一个用得很普遍的“囡”。《集韵》收了个字，注音是“九件切”，和各地读音都很贴合：闽南话kiã³，闽东话kian³，闽北话kyain³，海南话kia³。义注“闽人呼儿为囡”也十分准确。大多数闽方言这个“囡”已经虚化，用作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子”的ŋ表小指爱ŋ的名词词尾，如说“椅囡、刀囡、猴囡”。很难设想，这么重要的核心词在上古汉语中毫无踪迹，突然从闽地创造出来，并且用得这么广泛和频繁。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古百越语借用的。罗杰瑞和梅祖麟（1974）早就指出这是古代南方方言从南亚语借用的。根据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闽台地区相近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之前，这一带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肯定是南岛文化。和闽语的“囡”音义相同的说法可以在孟高棉语族里找到。（李如龙，2005）

诸如此类的核心词还有一些，只见与东南方言，未见于早期文献和官话方言区，都在多种南方少数民族语言里可以找到音义相当的常用词，有些词虽然古时的韵书有过记载，是因为这些底层词在当时的东南方言已经很常用，所以收进了韵书。例如：

骹 闽语音k'a¹，指脚又指腿。是很常用又构词能力强的核心词。壮语音ka¹、k'a¹，傣语xa¹，黎语ha¹，水语qa¹。《集韵》收了此字，口交切，注：胫骨近足细处。在古今汉语里普遍常用的是“足”和“脚”，如果是上古汉语传下来的，何以用例极少，而那么多南方民族语却“不约而同”地借用了这个指马的“近足细处”的汉语词呢？这个说法若不是汉台语的同源词，便是闽语向壮侗语借用的底层词。

解 《广韵》蟹韵匣母上声，胡买切，“晓也”。这是闽语普遍通行的常用词，可单用作动词，表示会、能、知道、懂，也用作助动词，福州音a⁶，厦门音e⁶，泉州音e⁴，潮州音oi⁴，海口音oi⁴，建瓯音o⁷，各地读音均能对齐。“解”曾是唐诗的常用字，音义也合（杜诗“遥想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则是），在现代汉语只用于“解数”一词。而在现代壮侗语则还很常用，音都能对齐：傣语的元阳、元江音hu⁴，绿春音hau⁴；在壮语，临高音hu⁴，武鸣音yo⁴；侗语音wo⁴，仫佬语音yo⁴，意义也都是“知道、会、懂”。“解”的原始音应是见母，原始义是“庖丁解牛”的用法。这个读为胡买切训为“晓也”的“解”，汉语和壮侗语是谁借谁，或者更古远的同源词，很值得进一步探究。

媪 客家人普遍呼母曰me¹，俗写为“媪”，音同“尾”，次浊上读归阴平。对旁人则称ue¹，俗写作“娘”，“父母”合称“爷娘”。原来，客家的母亲是操持家务最辛苦的，俗话说“灶头镬尾，针头线尾，田头地尾”都由她包，但在社会上却没地位，祭祖宗不能上厅堂。这大概是南下的客家汉子娶了原住民姑娘的原因。“阿媪”是子女对母亲最亲热最崇敬的称呼。《广韵》齐韵莫兮切：媪，齐人呼母。《集韵》哈韵于开切又有媪：婢也。两种称呼反映了客家妇女的特殊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壮语和傣语普遍称母为me⁶，一般构拟原始壮侗语都写作*me⁶或*mi⁶、*bi⁶。看来，从母亲的语言称母，是合乎情理的，这是客方言向壮侗语借用的确证。媪（娘）则是汉人按其传统观念所定的社会称谓。

东南方言同壮侗等民族语言接触已有二千年历史。有些底层词由于广泛运用也可能进入了古时的通语。这类词既然是反映最重要概念的核心词，也可能就是汉语和壮侗语早期就有的同源词。总之，多做此类基本词的比较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语料多起来了，对我们判断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与南方诸民族语的各种关系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从单个语词入手拿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作比较，固然也能发现一些重要的方言底层现象，但是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经过一两千年的变迁，各种语言的音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保留最早音义又能对应得整齐的，即使有也很少。尤其是两个单点的比较，若不能用各自的亲缘语言来论证，更是难以确切。严格按音义相同去找这么难，如果选择“一音之转”的方法去找，则潜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一转是客观存在的或主观的搪塞，也是很难查证的。

任何语言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无论是语音、语法或词汇都莫不如此。方言与民族语的比较更应该从系统出发，作系统的比较，着力于找出一批语言之间的种种对应关系。单个语词的借用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发生的，不论发现多少词条，人们总以为是一种接触的影响；系统的对应就不同了，要么是同源分化中的变异，要么是长期接触之后的伤筋动骨的转型。诚然，种种对应之中又有深层和浅层、主要和次要、整体和局部之别。只有发掘了大量材料之后才能把大大小小的对应规律理出大系统和小系统，从而为语言之间的关系作出定性的分析。无论如何，尽管单个词汇的比较很直接，有说服力；对应规律有时几经转折会使人费解，甚至难以置信，但是从性质上说，系统的比较还是远胜一筹的。二者相比之下，应该说，词汇的比较只是“形似”，对应比较才是“神似”。

近些年来，随着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系属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国际接轨后的较量和切磋，随着汉语学者和民族语学者的联合攻关，汉语民族语言的系统对应比较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研究方法上说，不但运用古文字资料和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语料构拟上古、远古汉语并拿它和汉藏系诸语言作比较，也越来越多地拿鲜活的汉语方言语料和古汉语和汉藏语作比较，从而使这项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在许多问题上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试就有些学者提出的若干观点，结合自己多年来研究东南方言所得的材料，为某些存在的困惑寻求解答问题的出路，也为先进的行家所开辟的路子平整一些路面，为方言的底层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先讨论关于先喉塞音声母问题。李方桂先生（1977）根据一些壮侗语 b、d 声母字分布在阴调类的事实，把原始侗台语的这类声母拟为ʔb、ʔd。陈忠敏多年研究了东南方言与壮侗语的先喉塞音问题，先后发表过几篇文章。1995 年他在《民族语文》发表的论文中概括了如下的论点：先喉塞音在东南方言中集中表现在唇音和舌尖音两类，分布在

吴、闽、粤、湘诸方言；从发音方法上有保留ʔb、ʔd的，有弱化为浊音（m、n、v、l）和清音ʔ的；除帮端两类外还见于见母，读为ʔj。现代的侗台语正是这样，四个语支的多数方言都有先喉塞音声母。ʔb、ʔd为多，有的还有ʔg，没有ʔb、ʔd声母的语言（如侗语），与之相对应的也是m-、l-等通音。汉语东南方言的这些表现，显然是壮侗语留下的底层现象。这已经成了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定论。这里想补充说明几点：

1、先喉塞音在闽方言中远不是只表现在海南闽语的ʔb、ʔd两种典型的发音上，在闽南本土，尤其是厦门话里也有系列的表现，其类型是变读为无喉塞的浊音。例如：

八 表示认识，曾经之意（见李如龙1996），在各地闽南话多读为p-，泉州pat⁷，潮州pak⁷，但在厦门说bat⁷。

摆音 动量词（如上文所述，可能是壮侗语底层词），泉州、潮州音pai³，厦门音māi³。

要、意欲（本字未明，闽南俗写作“卜”） 福州音puo⁷，泉州音bo⁷，厦门音be⁷，漳州音bue⁷。

缚 表示“包圆买下”。泉州音pau⁸，厦门音māu⁸。

反 左手说“反手”，漳州音pāi³ ts'iu³，厦门音bai³ ts'iu³。

掇 推拿的“拿”闽南话说掇，泉州音lo⁷，厦门音le⁷。用手把轻物拿起也说。

条 用于纸条（指长条形的纸）、椅条（长凳），泉州、厦门音liau²。

边 用于“临边”，意为“立刻”，厦门音liam² mī¹。

双手搬动重物，本字未明，泉州话ka²，厦门音gia²。

用手轻举长条物，本字未明，泉州话ka⁸，厦门音gia⁸。

锦 泉州、漳州音kim³，厦门音gim³。

夹 用于“夹菜”，泉州、厦门音gue⁷。

夹 用作名词、动词都是gue⁸的音。

2、在闽北方言，先喉塞的痕迹不但在帮（并）端（定）见（群）有表现，在精母也有。从今读的类型说，在石陂、建阳分别读为b、β、d、l、dz、g、ŋ等，多为浊音，在建瓯多读为清音p、θ、x等，也有一些字读为l。在声调上往往和来自非先喉塞的同类清声母有别。这些字也就是有名的闽北“清音浊变”的现象。这些字从调类上说平上去入都有；从词性说，名、动、形都有。用先喉塞的浊音底层来说明是最确切的了。兹按声类列举音义最明确的例字如下：

帮(非)	崩	飞	反	补(~衣)	癖(~子)	发	迫(窄)
石陂	baiŋ ²	fiye ²	paiŋ ³	pyo ³	py ⁵	buai ³	ba ³
建阳	βuaiŋ ^{2b}	fiye ^{2b}	βuaiŋ ³	βio ³	py ⁵	βoi ³	βa ^{2b}
建瓯	paiŋ ³	ye ³	paiŋ ³	pio ³	py ⁵	pue ³	pa ³

端(知)	担(动词)	单(~身汉)	赌	转	躲	戴(动词)
石陂	daŋ ³	tuaiŋ ¹	du ³	teiŋ ³	□tu ¹	tuai ⁵
建阳	laŋ ^{2b}	lueiŋ ^{2b}	lo ³	lyeiŋ ³	ly ³	le ⁶ ~帽 lue ⁵ ~手表, ~孝
建瓯	taŋ ⁸	tuiŋ ³	tu ³	tyiŋ ³	ty ³	tue ³

精	焦(干)	增(粥稀)	簪	饗(味淡)	早	醉	荐(草垫)
石陂	diau ²	dzaiŋ ²	dzaiŋ ³	tsiaŋ ³	dzo ³	dzy ⁵	dzuŋ ⁵
建阳	lio ¹	loiŋ ^{2b}	laŋ ^{2b}	liaŋ ³	lau ³	ly ^{2b}	ly ^{2b}
建瓯	tiau ³	(饗tsaiŋ ³)	tsaŋ ³	tsaiŋ ³	tsau ³	tsy ³	tsy ³

见(1)	高	菇	饥	稿 (稻草)	狗	筲 (通水管)	羈 (拴)	割	蕨	公 (老~)	铰(剪)
石陂	fiɔ ²	fiu ²	gye ³	(秆)	fu ³	aiŋ ³	gai ²	fiuai ³	fiye ³	ouŋ ¹	(剪)
建阳	fiu ^{2b}	o ^{2b}	kye ¹	(秆)	həu ³	aiŋ ³	kai ¹	kɔ ⁷	fiye ^{2b}	oŋ ¹	kau ¹
建瓯	au ¹	u ³	kye ³	ɔ ³	e ³	aiŋ ³	kai ³	uai ³	ye ³	ɔŋ ¹	kau ⁸

见(2)	嫁	教(~书)	救(~命)	肝	秆	裹(~粽)	桔	韭
石陂	ka ⁵	kau ⁵	kiu ⁵	xuaiŋ ¹	kuaiŋ ³	xɔ ³	xi ⁷	xiu ³
建阳	xa ⁵	kau ⁵	xio ⁵	xueiŋ ¹	kueiŋ ³	(包)	xi ⁷	xiu ³
建瓯	xa ⁵	xau ¹	xiau ⁵	xuiŋ ¹	kuiŋ ³	xo ⁵	xi ⁷	xiu ³

对照闽北的这类情形，回头看看闽南，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

迹 单用意为痕迹，也用于方位指代词“即迹（这里）、许迹（那里）”。泉州厦门音liaʔ⁷。

爪 骹爪、爪牙都说liau³，泉漳厦同音。（以上是精母）

锅 闽语铁锅说鼎，但陶锅、铝锅仍说锅。泉州音ə¹，厦门音e¹，漳州音ue¹。

顾 单说表示袒护。泉州、厦门同音ɔ⁵。

今 仅见于惠安话，“今暗”说im¹am⁵。（以上是见母）

关于闽北方言的“清声母浊化”，罗杰瑞曾有过原始闽方言的另一类声母的拟测，后来，王福堂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一文，认为是受吴方言的影响而表现为上古音层次和中古音层次的叠置。现在看来，吴语也有先喉塞音的痕迹，闽北与吴语区毗连，说是受吴方言影响也并不错，然而，何以闽南也有而且海南还有更加充分的直接表现？这是吴语的影响难以解释的。看来，用壮侗语的底层来解释，才是一步到位地抓到了根本。至于闽北的见母字分为两类，在清音化的建瓯一类读零声母，一类读x，显然是读x的先清化，读为原调，而读为零声母的是后来才清化的，即h→h/h→∅，声调上还保留着一个小尾巴。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到陈忠敏（1995）一文最后所根据的东南方言先喉塞音声母与壮侗语有别的特点之②（“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先喉塞音对声调不起分化作用”）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在闽北，先喉塞音弱化为浊音之后，曾引起了声调的转移。

再讨论关于精组字读t、t'及相关问题。

麦耘（1997）在《中国语言学报》发表了《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一文，认为珠江三角洲以西的粤方言中不少有把一些精、清母字读为t、t'，从心邪等母读为θ或ɬ的现象，和壮侗语的同类表现形成对应，应该是早期原住粤西、桂东的“汉化与未汉化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当地人的口音”。现代壮侗语的塞擦音普遍都不发达（尤其是送气的ts'），黎语通什话和壮语的不少方言至今都还没有塞擦音声母。在借用汉语词时，壮语用s对应精组字和章组的擦音字（如心sim¹，书sau¹，城sin²），用ç对应知庄章组的其他字和精组的细音字（如车çi¹，中çun⁵，茶ça²，装çain¹，砖çin¹，井çin³，象çin⁶）；傣语则精庄章不分，塞擦音读ts，擦音读s。李方桂先生在构拟原始台语时把tç、tç'、dz与s、z处理为互补的关系。麦耘认为原始壮侗语应有一套tθ、tθ'、θ声母，后来变为ts、ts'、ɬ，再后来又变为t、t'、ɬ。

精组字读为塞音，在壮侗语牵涉到古音拟测，在汉语东南方言还分布在赣语和闽语，并且牵连到透定母读为擦音的问题，确实是东南方言的壮侗语底层研究的重要题目。

壮侗语不少方言没有塞擦音，即使有也是送气音缺位，苗瑶语则有多套塞擦音，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就列了五组 34 个塞擦音。但是张琨先生在《原始苗语的声母》一文中说过：“并非所有苗语的塞擦音声母在原始苗语都是塞擦音。就像我们所见到的，有的是后随*r 或*l 的塞音的反映形式。另一些又是来源于后随*j 的舌根塞音。”看来，许多现在有的塞擦音是后起的，所以吴安其的《汉藏语同源研究》(2002) 所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和原始藏缅语都只有 s，没有 ts、ts'。并且认为“原始汉藏语无塞擦音”(P302) 看来，塞擦音在古今汉藏语的来龙去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东南方言，精清母字读为 t、t'，集中表现在海南闽语和武夷山两侧的赣语和闽语，这些方言里还连带着把透定母字读为 h 声母。闽方言普遍是从母混精、庄章归精、澄归定，因此在海南闽语读为 t、t' 的还包括了一部分章、从、澄等声母字，而清、昌等声母字因为变读为 s (和许多壮侗语一样，看来也是一种底层现象)，所以没有参加这种对应。例如：

	左	朱	罪	纸	醉	早	枣	走	杂	砖	准	作	粽
海口	to ³	tu ¹	tui ¹	tua ³	tui ⁵	ta ³	tau ³	tau ³	tap ⁸	tui ¹	tun ³	tɔk ⁷	taŋ ⁵
琼海	to ³	tu ¹	tui ⁶	tua ³	tui ⁵	ta ³	tau ³	tau ³	taʔ ⁸	tui ¹	tun ³	toʔ ⁷	taŋ ⁵

	桃	腿	啼	台	跳	头	潭	炭	脱	糖	听	桶	虫
海口	ho ²	hui ³	hi ²	ha ²	hiau ⁵	hau ²	ham ²	hua ⁵	hut ⁷	ho ²	hia ¹	haŋ ³	haŋ ²
琼海	xo ²	xui ³	xi ²	xai ²	xiau ⁵	xau ²	xam ²	xua ⁵	xut ⁷	xo ²	xia ¹	xan ³	xan ²

在赣语区，只有宜黄、乐安、南丰等少数点把精、庄母读为 t。例如宜黄：租 tu¹，楚 t'u³，灾 tai¹，早 tou³，债 tai⁵，而更多的点都把清从母字和一些初崇母字读为 t' 声母，洪音居多，有的点也有细音字。下例中，南城、建宁是赣东典型老赣语，反映比较完整。另有桂东的蒙山县西河镇说的是客家话，也有同样的反映，附在这里介绍，也可以说明客赣关系的一种表现：

	坐	叉	蔡	财	草	巢	餐	擦	切	前
南城	tʰo ¹	tʰa ¹	tʰai ⁵	tʰai ²	tʰou ³	tʰau ²	tʰan ¹	tʰai ⁷	tʰe ¹ ie ⁷	tʰe ¹ ian ²
建宁	tʰo ³	tʰa ¹	tʰai ⁵	tʰai ²	tʰau ³	tʰau ²	tʰan ¹	tʰai ⁷	ts ¹ iet ⁷	ts ¹ ien ²
西河	tʰo ¹	tʰa ¹	tʰoi ⁶	tʰoi ²	tʰau ³	tʰau ²	tʰan ¹	tʰat ⁷	tʰian ¹	tʰien ²
邵武	tʰo ⁶	tʰa ¹	tʰai ⁵	tʰai ²	tʰau ³	tʰau ²	ts ¹ an ¹	tʰai ⁷	tʰien ¹	tʰien ²

透定母读为 h 声母在老赣语区是与清从等母字读 tʰ 相呼应的，另有赣中的吉水只有透定读 h 而没有清从读 tʰ，上述西河客话则有清从读 tʰ 而无透定读 h。例如：

	台	袋	桃	头	豆	淡	腿	炭	蛋	大
南城	hai ²	høy ⁶	hou ²	hiəu ²	hiəu ⁶	han ¹	høy ³	han ⁵	han ⁶	hai ⁶
建宁	hai ²	hei ⁶	hau ²	həu ²	həu ⁶	ham ⁶	hei ³	han ⁵	han ⁶	hai ⁶
吉水	hoi ²	hoi ⁶	hau ²	heu ²	heu ⁶	han ¹	hoi ³	han ²	tʰan ⁶	hai ⁶

在闽北的武夷山东侧，从邵武、泰宁到崇安、建阳也有比较完整的反映，以邵武、泰宁和建阳为例：

	拖	吞	托	袋	潭	草	葱	错	贼	族
邵武	xai ¹	xon ¹	xo ⁷	xoi ⁵	xən ⁷	tʰau ³	tʰuŋ ¹	tʰo ⁵	tʰə ⁷	tʰu ⁶
泰宁	hai ¹	hun ¹	ho ³	hai ⁶	hŋ ⁵	tʰo ³	tʰuŋ ¹	tʰo ⁵	tʰoi ⁵	tʰu ⁷
建阳	hue ¹	huŋ ¹	ho ⁷	lui ⁶	laŋ ²	tʰau ³	tʰoŋ ¹	tʰo ⁵	tʰe ⁸	lo ⁸

何大安在《论赣方言》一文（1986）中曾注意到清从读 tʰ 和透定读 h 是“互相关联”的，但这是否底层现象，他“暂时存疑”。

现在把帮端等读先喉塞，精清等读 t, tʰ 和透定读 h 这些相关的问题合并起来讨论其分布特征、表现的性质及发生的年代（所属的历史层次）。

这三种东南方言声母上的重要特点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在海南闽语之中，其次是赣东和闽北方言，三者都涉及了；在粤语的表现是：帮端和精清作伴，在赣语则多为清

从和透定同行。在吴方言只有帮端的读法有表现。从整体上看，三者确实是互相关联的。

为什么说这三种特征是东南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呢？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些表现仅见于古百越人（壮侗语诸民族）的原住地上形成的东南方言，而未见诸官话区。辛世彪的文章（2002）曾提到关中方言也有些点把精清也读为 t、t'，但那只见于细音字，明显是 tsi、ts'i 由于 i 的影响把擦音 s 挤掉的结果。其次，就壮侗语方面看，“多数语言有一套带先喉塞音声母ʔb-和ʔd-，个别语言还有ʔd-和ʔg-，但逐渐趋向简化和消失”（马学良主编，2003）。就和东南方言关系最深的壮傣语支的情况看，壮语没有 ts、ts' 声母（s 实际读音为θ和ɬ），布依语和傣语只有 ts、s，没有 ts'，壮语和布依语只有 h（或 x）没有 t' 和 k'。可以想像，壮侗语支的先民学习汉语时可能就是用 t、t' 代替 ts、ts'（精清），用 h 代替 th（透定）的。实际上本文未列入讨论的还有东南方言中的赣、客、粤、湘诸方言广泛存在的溪母读为 h（合口字又变为 f），乃至滂母字读为 h（见诸闽北建阳）或 f（见诸海南闽语），应该也是和壮侗语的这个声母格局相关联的底层现象。第三，就东南方言的内部语音结构系统看，这些变异并非语音系统之内的有关条件所造成的，也不是词汇、语法现象的反映，用语言接触的“底层”现象来解释是最合理的了。

为什么会出现各地方言的不一致表现呢？例如在海南闽语和西片粤语是精清读为 t、t'，在多数赣语和闽北闽语则是清从读为 t'，而透定读为 h，在粤语则没有表现。壮侗诸语言的声母对照表给了我们最大的启发。上文已经提到，壮语没有 ts、ts'，只有ɬ、θ，没有 s；在布依语和傣语先有了 ts，还没有 ts'，水语的 ts' 只用于汉语借词。可见，壮侗诸语言的舌尖塞擦音是后起的（可能就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就产生的顺序说，先有 s，后有 ts，最后才有 ts'。可见东南方言中的不同表现是分层次的，原封不动地保留ʔb-、ʔd-和精清读 t、t'，透定读 h，乃至溪群母字读 h 和滂并母字读 h 或 f 是最早、最完整留存下来的底层；精母字不读 t，只有清、从母字读 t'，是在壮侗语出现了 ts 声母后才移借过来的。

为什么这些现象会集中、全面地表现在海南闽语和闽北闽语呢？在东南方言中，闽方言就目前的状态说是和上古汉语关系最深的，有许多“前广韵”的特点，这是学界公认的。而海南孤悬海上，闽人上岛是在操壮语的临高人之后，开始时人数一定不如临高人多。几百年间海南人的闽语和临高人的壮语共处，相互间的接触和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闽北原是闽越人的老根据地（武夷山下发掘的大规模的汉城可

以为证),后来越人迁走了,汉人入住了,到了宋代曾一度繁荣,后来没落成了闭塞的山区,与外界往来极少,保存许多早期形成的语言现象,也是情理中的事。

那么,这些“底层”现象究竟形成于什么年代呢?既然认定为“底层”现象,总的说来应是南下汉人与百越族原住民融合的早年留下来的现象。这些现象一旦出现之后,虽然也会有整合和变化,但由于汉族的文化上的优势,总的说来,总是逐渐地汉化——纳入汉语演变的轨道,逐渐减少原住民语言的异质特征。同时,在考察有关语言现象的历史层次的时候,还应该参考语言演变的历史过程来定位,也要联系社会历史背景的事实来考虑。不同的现象可能有先后,从这些现象的分布有时也可以得到分析历史层次的启发。

帮端等声母字读为先喉塞音,既然在壮侗语的四个语支都有广泛的分布,在东南方言中,吴、闽、粤、湘都有表现,这应该是汉语和壮侗语广泛地接触,长期地影响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底层现象又是逐渐消磨着,变得越来越少。帮端的先喉塞音既然还有广泛的表现,就不会是中古之后才形成的。辛世彪(2002)曾根据闽粤语的先喉塞音只配阴调而认定“此现象是发生在浊音清化之后,即北宋以后引起的链式反应”。现在看来,这个推论不妥。第一,闽北的先喉塞音也有出现在阳调类的(已如上述),即使是只出现在阴调类,也可以做相反的理解:当浊音未清化,阴阳调类尚未分化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汉语的浊音字清化了,它们并未清化,于是就在原调类呆下去。有些汉语方言浊音清化后,不论原来是清是浊一概还读为原调类(阴调类),与此是同理的。很早就研究先喉塞的日本学者平田昌司(1983-84)说过:“汉越语反映三等重纽的区别,其借用年代在于唐代。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唐代已经有些南方方言把帮端母读为缩气音。”这一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精组读为t, t', 麦耘(1997)和辛世彪(2002)也认为是北宋浊音清化之后发生的。他们的重要依据是,从邪和定母清化之后并没有跟其他清化的浊音走,而是继续读为不送气清音。这一点和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相联系的:究竟精清读为t, t'和透定读为h是壮侗语原生面貌或是从塞擦音ts, ts'变过来的。麦耘推测壮侗语的精清母字是从另一个塞擦音tθ, tθ'变来的,但是看来在更早的原始壮侗语应该是没有塞擦音,只有t, t'的。壮语至今没有ts、ts',布依语至今没有ts',水语的ts'也只用于汉语词的对音,这就是有力

的证明。如果壮侗语的ts、ts' 是受汉语影响而来的^①，那么，ts、ts' 的出现应比ʔb、ʔd的存在更晚一个时期，这样，ts、ts' 读为t，t' 就正好是稍后于ʔb，ʔd的影响出现的。这时沿着原有的塞音模式，又吸收了汉语的清化的ts，ts' 的结构特点，用t，t' 来代替ts、ts' 也便很好理解了。既然精清的读为塞音和帮端保留先喉塞音或略加改造，去掉先喉塞保留其浊音，二者之间就有着一个阶段的时间差。在保留浊音上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在赣东和闽北正是客赣系方言送气音大发展的浪潮上，精母已经没有t的读法，清从一概读为ts'，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与此相连带的透定读为h，显然是一种推拉链作用的结果，因为清从母字和透定母字都不少，没有这样的推移，同音字就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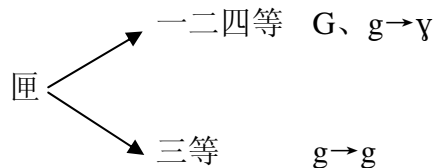
可见，从壮侗诸语言的现实语音结构和这些底层现象的分布和社会历史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现象应该是上古到中古之间形成的，其中并有先后。帮端的先喉塞在先，其后是精清读 t、t'，再后是透定的擦化。

四

关于东南方言和壮侗语的语音比较还有几个覆盖面较小，但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的问题，这里也提供一些福建方言的材料加以论证。

第一、关于影晓匣云的拟为小舌音。

潘悟云在《喉音考》(1997)一文中提出，上古汉语的影晓匣云应该是一套小舌音。它们到中古的演变关系是：影 q→ʔ，晓 qh→h，云 G→ɦj，



他用大量汉藏语材料和上古谐声材料以及域外对音资料做了详细论证。结论可谓信而有征。许多学者都已经认同。这里罗列几个闽语方言词，都是原来难以确定本字的，用这套拟音来解释就通透了：

蛙 闽南管青蛙叫sui³kue¹，以往都以为是“水鸡”，确实kue¹也与鸡同音。但是有的

^① 关于壮侗语受汉语的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戴庆厦(1990)说，“古越人使用的语言不会是汉藏语言，而是与印尼语有关的南岛语系语言。后来这种语言长时间地，大面积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变以逐渐形成为今日的壮侗语。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可以视为有亲属关系，因为语言影响已导致语言的质变，而与影响的语言有机地形成亲缘关系。”

地方又说kap⁷kue¹就很难解释了。在不少壮侗语里蛙类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侏佬语：青蛙kwai³，田鸡kəp⁷，傣雅语：青蛙ka:p⁷，麻韵闽南话白读为ue（如花、瓜），kue¹可以确定为“蛙”，音合义切。

邀 建瓯话用作连词，相当于通语“和，同”，音iau¹，如说“我邀渠话过”（我同他说过）。闽南话也有连词kiau¹，如说“汝邀伊做阵来”（你同他一起来）。“邀”可以看作是早期闽语共有的词。

娃 闽南旧时尊称女性往往在名字后加上kuā¹，与“官”同音，俗写做“娟”。实际上应该是娃读kua并带上鼻化。闽南话a、ia、ua等韵有些字会加上鼻化音，例如怕pã⁵，炸tsã⁵，且tsĩã³，寡kuã³（次浊声母马、拿、雅更是读成鼻化韵）。唐代旧制就是称呼中年妇女为“娃”的。

埋人、埋物于地 闽南话都说kam³，《集韵》感韵影母和见母都有与此义相关的字。邬感切：盒，覆盖也。罍，《说文》覆也。揜，《博雅》藏也。掩，阮也。掩，覆取也。古禪切：砥，以石盖也。鬻，盖也。这也反映了早期汉语影母和见母是有许多音近义同的字的。说影母读q-可信。

晓母读为k' 也有不少口语常用字可以作证：呼鸡呼狗，福州话说k'u¹，厦门话k'ɔ¹，姓许，闽南话普遍说k'ɔ³（音同苦）。薺草，闽南说k'au¹。“鞋靴”福州音k'uo¹。火，建阳音k'ui³。老虎，建瓯音k'u³。豨（《集韵》许岂切，豕），建瓯音k'y³。稀，《广韵》许羈切：“稀，杓也。”闽语用于水勺、粪勺。福州音xie¹，厦门音hia¹，永安音k'ya¹，都是很好的例证。

匣母字在上古是浊塞音，在各地闽语的白读音都有一二十个字读为k声母，就是从g-清化而来的，这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例如糊、厚、咸、悬（高）、县、行（走）、猴、寒、汗、含、滑、猾、下（低）、环等等，都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字。这里还有另外几个字值得一提：

鲑 《广韵》户佳切，“出《吴志》”，《集韵》注得更具体：“吴人呼鱼菜总称。”今福州话音kie²，建瓯kai³，厦门音kue²，潮州音koi²，雷州、海口音koi²，义为腌制的小杂鱼。厦门话“无鲑无菜”正是指荤菜（鱼菜总称）。此字未见于今吴语，是闽语更保守地留存了古吴语的一例。

峡 厦门音k'ue⁸，义指“夹缝”。可用于“山峡”，也可用于“灶峡”。

𦨭 福州音kien², 厦门音kĩ², 建瓯音haiŋ⁵, 显然来自匣母, “𦨭”是俗写, 与“船舷”是同源字。

下 厦门音ke⁶意为低, 音k'e⁶是“放下”之意。另有e⁶是方位词“下面”和动量词“一下”。标志着不同的层次并因音别义。

荷 《广韵》胡可切, 见于客家话, 浊上读阴平, 梅州音k'ai¹。就是“戴月荷锄归”, 今义为“肩挑、担负”。

匣母字在闽语有k、k' 和∅三种读音, 不少学者认为上古有两类, 潘悟云已有相关的论述, 此处不再讨论。云母字在闽语有读h声母, 如雨(福州huo⁶, 厦门ho⁶), 远(福州huoŋ⁶, 厦门hŋ⁶), 园(福州huoŋ²、厦门hŋ²), 晕(厦门hun⁶), 纬(厦门hui⁶)。这应该是上古的G变为中古的fj-清化之后的音。还有没有保留浊塞音读法的例证? 在闽南话可以确认的只有几个字: 曰guat⁸, 这是塾师一代代传习下来的。袁guan², 于姓氏, 一般读音比较保守。团员、团圆都有人读guan², 也许是连读的影响。泉州一带至今还流行的梨园戏, “梨”只有文读音le², 园可以文白两读guan²、hŋ²。小时候听《陈三五娘》, 有过“行为”读为kiã² gi²的音, 后来研究闽南话了, 觉得奇怪, 这两个字不读文读hiŋ² ui²而读白读, 而云母字为却读为疑母! 现在看来, 这是十分讲究唱腔和道白的艺人们世代相因保护下来的。

龚煌诚最近在《从汉藏语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一文中写道: “随着汉藏语言比较的进展, 慢慢的显现汉语来(l-)母字对应的是藏语的r-, 而汉语的喻(r-)母所对应的却是藏语的l-。”(P33)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支持匣、群、于三母同出一源的假设。”匣群云在G、g上的纠缠应该是有结论的时候了。

第二、关于塞音韵尾脱落后的鼻尾化。

罗美珍(1984)报道过傣语“武定话凡第8调(阳入声短元音)的字都变为-ŋ尾; 绿春话有一部分人把塞音韵尾都读为-ŋ尾, 有一部分人读为高元音-y尾, 但保留少数词念-ŋ尾。”例如:

	爱	指甲	沸		嘴	七	菜	
版纳	hak ⁸	lep ⁸	fot ⁸		sop ⁷	tset ⁷	phak ⁷	版纳
武定	haŋ ^{4,8}	liŋ ^{4,8}	feŋ ^{4,8}		sueŋ ^{3,7}	tsiŋ ^{3,7}	phaŋ ^{3,7}	绿春

黄勇（1995）报告过侗语里类似的音变：“侗语中有相当一部分-p 尾和-t 尾在一定元音条件下并入了鼻音尾-n。”

	提	十	吹	尾巴	七
章鲁	sap ⁷	ɕəp ⁸	səp ⁸	sət ⁷	sət ⁷
李树	sən ⁵	ɕən ⁵	sən ⁶	zen ⁵	tshen ⁵

在闽北赣语的邵武、光泽话里，古咸深二摄的入声字，韵尾-p 弱化（浊化）为-m 和-n。例如：（引自李如龙，1991）

	答	塔	纳	夹	法	急	立	十	汁
光泽	tam ⁷	xam ⁷	nom ⁸	kam ⁸	fam ⁷	kəm ⁷	ləm ⁸	ɕim ⁸	tɕim ⁷
邵武	tan ⁷	t'an ⁷	non ⁶	kien ⁷	fan ⁷	kən ⁷	lən ⁶	ɕin ⁶	tɕin ⁷

在赣东的余干话，不但-p 尾发生浊化，变为鼻尾，连-t、-k 尾也发生同类的变化。例如：（引自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合	笠	泼	蜜	脚	角	贼	额	屋
余干	hot ⁿ⁸	lət ⁿ⁷	p'ot ⁿ⁷	mət ⁿ⁸	tʃək ⁿ⁷	kək ⁿ⁷	ts'ək ⁿ⁸	ŋək ⁿ⁷	uk ⁿ⁷

余干的鼻音尾只是塞音之后一个后续的轻音，到了光泽、邵武就喧宾夺主成为主体韵尾了，而塞音成分则只留下发音短促的声调特征。这两种情况不但论证了在赣语有与傣语方言里那种塞音韵尾鼻尾化的情况，而且提供了一条演变途径的例证。剩下的问题是，赣语和傣语的这种相似表现究竟是类型的趋同呢，还是底层的留存。从理论上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如果联系到壮傣语支的先民在这一带住过，而赣语又有多种语言对应可以说明是底层现象，人们很容易判断为后者。

第三，关于闽南话鼻音声母擦音化。

考察东南方言的底层现象还不能不提到闽南话里鼻音声母擦化的现象。先把常用字中鼻音声母读为 h- 的列在下面，除注明的之外，都标厦门音：

明母	茅	棉	默	晚	媒	莓	枚
	hm ²	hĩ ² (南安)	hmɿ ⁸	un ³	hm ²	m ²	m ²

泥日母	年		诺	箸	燃	耳	肉	喏 (唱~)
	hi ² (海口)	fi ² (琼海)	hioɿ ⁸ (南安)	hioɿ ⁸	hiã ²	hi ⁶	hik ⁸	hia ⁶ (南安)

疑母	岸	危	艾	颜 (永春)	鱼渔	瓦	砚	额 (~头)	迎
	huã ⁶	hui ²	hiã ⁶	hiã ²	hi ²	hia ⁶	hĩ ⁶	hiaɿ ⁸	hiã ²

这其中有点必须做些说明。“花骨突”说“花莓”，花的量词可说“枚”均音m²。“晚季”漳州读muĩ³，泉州读un³，这三个不读h-的应该是h-的脱落。其中的“晚”是微母字，但与近代音微母读ø绝无关系，可以从海南“年”的异读得到启发。琼海的fi和海口h必是一先一后的演变，fi的读法和闽南的ø就十分相近了。又“棉”读hĩ²见于旧式织布机上挂经线的硬线做成的扣子，称为“hĩ² tsaj⁵”，本字是“棉棕”。“默”常叠用表示沉默不语但有心计。“诺”是肯定应答之词，和《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毫无二致。南安音 hiauɿ⁸、hioɿ⁸，漳州音hio⁸，厦门人已经不说了。“年”的h音见于粤琼闽语，闽南本土不读擦音。“唱诺”是对着菩萨或祖宗神位作揖。“迎”读为hiã²用于“用手抱菩萨”。“颜”hiã²的读音保存在今永春达埔镇，当地俗名“颜里巷”，住的是颜姓之民。

高本汉根据古明母和晓母有不少通谐字，拟构了xm的音，后来，学者们在西南民族语言里发现了许多配套的清鼻音声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为上古音拟有hm/m、hn/n等对立的声母，这个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从现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藏缅语来看，大多数语言中这类鼻音和边音的清化声母都是成套的。……因此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似不应仅有m̥，而且应有n̥, ɲ̥, l̥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马学

良 2003) 在壮侗语里, 壮傣语支未见清鼻音, 侗水语支则有。可见是与相邻苗瑶和藏缅的西片才有。这也许就是它在东南方言中作为底层现象保存得较少的的原因罢。

五

拿东南方言和南方民族语言作比较, 探讨方言的底层现象, 不论是从单个词汇入手进行音义比较, 或者是从语音入手, 寻找对应关系, 都会面临三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所找到的底层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还是横向接触的借用关系, 抑或是类型上的雷同? 这三种关系是属于不同性质的, 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和判断, 总是用“关系词”将它们一锅煮。这对于我们理解已经发掘的语言事实, 总结语言演变和接触的规律, 使整个研究纵深发展是很不利的。

底层现象通常被理解为早期民族融合过程中两种语言的相互借用。这里必须指出, 早期的借用是双向的, 而不是单向的。就东南方言和壮侗语的关系说, 唐宋之前, 东南方言有壮侗语的底层, 壮侗语也有东南方言的底层。例如“筷子”, 壮语说 tau^6 (武鸣)、 tu^6 (龙川), 侗语说 co^6 。这是向汉语借用的“箸”。读 t 、 t' 的应是唐以前的音, 和现在的闽语和赣语相近 (泉州 tu^6 , 建宁 $t'o^6$); 读 $ç$ 的是宋以后的音 (因 $ç$ 对应 $tç'$) 和赣客语相近 (河源 $ts'y^6$, 南城 $tç'ie^6$)。桌子, 武鸣壮语说 $ta:i^2$, 来自粤语 (广州 $t'oi^2$) 或吴语 (上海 de^2) 的“枱”; 龙州壮语说 $tco:\eta^2$, 来自闽语的“床” (莆田 $tu\eta^2$, 潮州 $ts'ə\eta^2$), 侗语说 $pi^2 pa:n^2$ 则来自“盘”, 今邵武话说盘儿 $p'on^2 nə^0$ 。此外, 还有好些是近现代向粤语方言和西南官话借用的, 这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东南方言向壮侗语借用是多语源的, 但从时间上说都完成于千年以前的古代, 而壮侗语向汉语或汉语方言所借用的底层词则是多来源、多层次的。因为彼此的借用都有了很长的历史, 加上古时候也可能有更多的方言差异, 有时就会使底层词和同源词难以辨认。例如骹 (口交切), 壮侗语有不少方言也说, 闽方言则十分普遍, 彼此语音是对应的, 语义上或兼指腿、脚或只指腿, 有些歧异。上古汉语有“足”, 近代汉语有“脚”, “骹”的用例见于汉魏, 字形和音义见于《说文》和《集韵》, 或指小腿或指踝骨, 或指人或指马都很含糊。像这种情形, 究竟是谁向谁借用了, 或者本来就是同源词, 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用起来, 发生了音义的变异? 可见, 由于交往历史长、分化语种多, 如果未经周详的调查, 要对底层词作出同源或借用的判

断，确实是不容易的。

词汇的借用在古往今来的语言接触中是经常发生的。汉语在借用外族词上相当保守，有些语言的外来词的数量甚至可以超过本族词。一个底层词的钩沉很容易被轻易地归结为借用而被轻视，然而借用多了，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如果会，又需要多少比例？有没有混合语的存在？如果有又该按照什么样的比率来界定？这些问题都曾经提出过，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语音对应规律找到了，也会有人认为那是类型上的雷同，有时要说明是同源关系也不容易。可见，还是要回到同源关系、借用关系和类型关系上考察三者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就像走到一个山头上的游客，既然只有三条登山的路，就可以考察一下这三条不同的路有什么不同？

本文所列举的东南方言的底层现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依靠这些材料自然难以探讨区分三足鼎立的界线，但是也许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方言向民族语言早期借用的底层词，通常在方言和民族语各自的内部是普遍通行的，语音上不但存在着明显的对应，而且读音相近，语义也比较一致，而且在民族语言中多未分布到别的语族，在汉语则未见于更古时期的通语和其他方言。例如吴闽语的“侬”，闽语的“团、鲑”都属于这类情形。这些根词借用的时间长了，又很常用，所以汉语古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未必太常用，有时方言中自制俗字，例如粤语的“谗、啱”，闽语、客家的“𪗇”。有时一直是“有音无字”或者采取代用字，例如闽南和客家的动量词“摆”，lut⁷（滑落）；客家的me¹，既有韵书的记录“嫫”，也有本地的俗字“媿”。

音类上存在明显的对应常常牵连到一批语词，而且通常是常用词。但是在方言和民族语言双方往往都是管着不同的字，有的表现充分，有的仅有零星的留存。上文提到的帮端母读先喉塞或浊塞音，精组字读为 t、tʰ，透定母读为 h，鼻音声母读为清擦音以及塞音韵尾弱化的鼻韵尾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形。这其中应该说三种类型都有，既有同源的，也有借用的，还有类型上的雷同，必须根据各种情况作具体分析。

先喉塞音主要见于壮侗语诸方言和汉语东南诸方言，在藏缅、苗瑶语族和上古汉语及北方方言都没有反映，应该属于东南方言中受壮侗语影响留存的特征。精清读为 t、tʰ 和透定读为 h，情况与此相类，民族语言主要见于壮侗语。壮侗语的塞擦音和各类送气音都是后起的，而上古的谐声关系中端、精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连。东南方言星星点点的局部表现也是早年受壮侗语影响的不同程度的留存。不过，吴安其（2002）认为原始汉

藏语没有塞擦音，如果此论成立，也可能这一条可以升级为原始汉藏语同源关系的残余表现。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清鼻音声母，在壮侗、苗瑶、藏缅各语族都有所表现，但不广泛，也不彻底。上古汉语的谐声关系明、泥、疑和晓母则关系密切。李方桂拟测上古声母立了 $m \quad n \quad \eta \quad l$ ，这一条似乎站在可上可下的十字路口。至于塞音韵尾的弱化为鼻尾，这明显属于类型上的雷同，而且发生的年代并不久远，应是在宋元丢失入声韵尾之后。塞音韵尾的弱化之路，从类型上说无非是由变浊到转类： $-p \rightarrow -p^m \rightarrow -m$ ， $-t \rightarrow -i$ （察→蔡）， $-k \rightarrow -u$ （削、薄），由合并到脱落： $-p$ 、 $-t$ 、 $-k \rightarrow -t$ 、 $-k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emptyset$ 等等几种。侗傣语和余干、邵武的情形只能是类型的趋同。

可见，并不是发现了语音上的明显对应都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同源的关系是纵向的演变关系，牵连全局的关系，其语音对应应该是语音结构系统中的要项，根据各种对应能把各种表现链接起来，成为理解整个演变过程，而又能说明全局的规律。例如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各种停靠站，从有复辅音到无复辅音的各种演化过程，从词缀演化成韵头的各种对应。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理出演变过程和规律而不只是零散的事实的罗列；能覆盖全面而不是只说明局部。借用的底层则是横向的接触，往往是局部的小系统，形成对应的语种有多有少，表现的程度有充分有不充分，管的词和字有广有狭。这种特征通常是不能牵动全局的。诚然，接触的影响可以由少到多地积累，量变到一定程度也可能造成质变。近些年来，关于壮侗语有一种越来越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由于长期而广泛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而从南岛语的无声调双音词语言渐变为有声调（并按平上去入的格局分化），由双音节缩减为单音节词，逐渐变得越来越像汉语。换言之，接触也可以造成类型的转化，造成亲缘关系的转移。用发生学的同源关系和横向接触的不断渗透和整合来解释澳泰语系的现实关系，也许是汉藏语研究的一条宽广的新道。然而也有另一种思路，由于发现东南方言的许多底层现象而怀疑这些方言原先并非汉语，而是一种“古南方语言”或者就是从古百越语变来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从整个的共时架构看，从古今演变的脉络看，东南方言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关系是无法推倒重建的。

类型是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分类，语言系统有大系统小系统，都各有自己的类型。对系统的分类总是几个可数的封闭性的选项。声调的有无只有两种，入声的有无就比较复杂：有入声调类的，可以读促调，也可以不读促调；无入声调类但原入声字归入何调，

归入别调之后是否完全不留痕迹，又有很多不同情形。语言的比较必须兼顾同源，接触和类型三个方面。事实上三者之间也是紧密相关连的，必须如实地把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语言系统的性质有科学的认识。在综合分析的时候还应该兼顾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轻唇读为重唇，舌上读为舌头，全浊上读归阴平，都反映了源流关系的异同，但是有的是成片的，例外不多；有的只是几个字保留了旧读，不构成系统，也不能成为类型的差异。拿它作为定性的根据是不合适的。鼻音韵尾有几个，是否转化为鼻化元音，这是类型上的差异，在语言接触中往往有相互的影响，有些变异是成系统的，但是个别音类上的分合并没有动摇大的系统。邻近的同类方言中分不分 n-l 或 n-、-ŋ，这是是很常见的，彼此照样沟通无碍，拿它来为方言定性分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可见，语言的比较还必须进行综合的分析，看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是怎样把同源现象、接触现象和类型的变异整合成一个共时的系统。总之，从具体语言现象入手，进行源流的、接触的、类型的分析，再综合地考察整体的系统，这才是比较研究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 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 年。
- 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 年。
-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夏威夷大学出版，1977 年。
- ：《龙州土语》，夏威夷大学出版 1940 年。
- ：《武鸣壮语》，夏威夷大学出版，1947 年。
-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
-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二版）》，民族出版社，2003 年。
- 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 年第 5 期。
- 潘悟云、陈忠敏：《中国语言学报》第 23 卷，1995 年。
- 陈忠敏：《作为古越语底层形式的喉塞音在今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和分布》，《民族语文》1995 年第 3 期。
- ：《汉语、侗台语和东南语在语言先喉塞对比研究》，《语言研究》1989 年第 1 期。
- ：《论南汇方言的三个缩气音》，《语言研究》1988 年第 1 期。
-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麦耘:《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中国语言学报》第 25 卷,1997 年。
- 戴庆厦:《从藏缅语看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增刊。
- 曾晓渝:《也谈水语全浊声母^mb、ⁿd的来源》,《曾晓渝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王福堂:《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中国语文》2004 年第 2 期。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 何大安:《论赣语方言》,《汉学研究》1986 年第 5 期。
- 郑张尚芳:《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浊塞音声母初探》,《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平田昌司:《吴语帮端母古读考(上、下)》,《均社论丛》1983-1984 年第 14-15 号。
- 罗美珍:《傣语长短元音和辅音韵尾的变化》,《民族语文》1984 年第 6 期。
- 黄勇:《李树侗话辅音韵尾的演变规律》,《民族语文》1995 年第 2 期。
-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年。
- 李如龙:《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年。
- :《说“八”》,《中国语文》1996 年第 3 期。
-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南开语言学刊》,2005 年。
-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 龚群虎:《南方汉语古越语地层问题新探》,《民族语文》2001 年第 3 期。
- 万波:《赣语 t t' 声母的来源及其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2 年第 3 期。
-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 年。
- 王辅世、毛宗武:《苗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 张琨:《原始苗语的声母》
- 其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恕未一一开列。
- Jerry Norman、Mei Tsu lin:“The Austroasiatics in a Ancient South China : Some Lexical evidences”, 1971.